

# 古稀老人守初心 惠女服饰展技艺

□ 施远圻 林杰

一台缝纫机、数条丝线……桌案前,惠安女服饰项目福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詹国平拿着一块花头巾仔细打量,时而戴上眼镜精心缝合,时而脱下眼镜在灯光下认真比对,时而用嘴轻轻吹掉缝时留下的边角料。

今年70岁的詹国平是泉州市惠安县崇武人,身高一米七左右,光看外表很难将这位老手与精美的惠安女服饰联系起来。从17岁起,詹国平开始学做惠安女服饰,至今已有53个年头,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接触这门手艺并坚持以此为业,他的



詹国平用缝纫机制作惠安女服饰

回答只有四个字:兴趣、责任。家乡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下去。他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将富有

## 源于兴趣

### 摸索中学习惠安女服饰制作

被誉为“巾帼服饰中一朵奇葩”的惠安女服饰形成于百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中,经历了几代人的传承,不断演变成其独特性。现如今,在惠安东部沿海崇武、山霞、净峰、小岞等4个乡镇的妇女仍保留穿着此服饰的习惯,受地缘、风俗影响,各乡镇间服饰略有差异,但衣服主体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

“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是对惠安女服饰最有趣、最形象的概括,其中“封建头”和“民主肚”是指惠安女的头

部总是严严实实地裹着头巾,却大方地露出肚脐;“节约衣”和“浪费裤”则是其上衣短小,而裤管特别的宽大。詹国平也是因其独特的服饰风格,被激发了兴趣。

1969年,年仅17岁的詹国平在山霞镇下乡时,看到身着惠安女服饰的妇女在海边劳作,“当时我觉得这身衣服设计得非常有意思,不仅外观好看还适合妇女们海边劳作,所以就对这身衣服感兴趣。”詹国平告诉记者。于是他开始摸索、自学制作惠安女服饰,而后拜惠安女服饰制

作师傅陈荣福为师,并先后在山霞镇、崇武镇开店制作、售卖惠安女服饰。

作为外行人,你可能会觉得惠安女服饰制作简单,仅用几块花布拼接而成。可是它的袖口、腰带花纹,衣服配色,裤子所呈现折叠的纹路都有讲究,“衣服细节设计很重要,要做好一件惠安女服饰并不容易。”詹国平告诉记者,刚学习制作惠安女服饰他需要三、四天时间方可完成,现在只需一天便可完成一套惠安女服饰制作。

## 寻求突破

### 从早期惠安女服饰找创作灵感

随着制作技艺越发纯熟,詹国平也希望在设计上有所突破。于是他将目光瞄向早期的惠安女服饰,“以前惠安女服饰都是惠安女们自己制作的,比如她们领口那些绣品饱含极好的寓意,通过看这些绣品,我在设计中也能得到更多启发。”詹国平说。

在寻访早期惠安女服饰过

程中,他发现从清朝到民国再到现在,惠安女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清朝、民国时惠安女服饰是将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在当时并未有“民主肚”这一说法,由于惠安女死后有将生前衣物焚烧的这一习俗,大多数年轻人是不了解惠安女服饰变化的。于是,詹国平便萌生收藏早期惠

安女服饰的想法。

受旧俗影响,所有老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穿过的衣物卖给詹国平。“一次不行,我就两次、三次,经常上门拜访这些老人,帮她们做力所能及的事,告诉她们我为什么要收集这些衣物饰品。”詹国平告诉记者。在他的藏品中有一件清末的惠安女衣服,

当时他上门讲求自己想法时,老人并不愿意给他,他便经常登门拜访,并告诉老人及其家人自己收购这件衣服意图,最终老人被其打动答应将这件衣服交由他收藏。

为了保存好这些藏品,詹国平还专门从永安市买回几个樟木箱用于存放。闲时他也会不时打理、晾晒这些藏品,确保这些藏品不因潮湿而霉变,他能清楚说出每件藏品的用途以及所处的年代,“看得多了,越发欣赏早期惠安女的智慧,也从中得到不少创作灵感。”詹国平说。



左为现代惠安女服饰 右为清末时期惠安女服饰

## 终于责任

### 用心传承惠安女服饰制作技艺

如今,70岁的詹国平仍坚持设计、制作惠安女服饰,除了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传承惠安女服饰制作的一份责任。耳聪目明的他还穿得了针线、踩得了缝纫机,但他深知惠安女服饰制作需要有人传承。

这些年也有不少慕名前来,拜詹国平为师,“来了我就教,首先他们要沉得下心,坐得住。”詹国平深知惠安女服饰制作太艰苦且难以以为生,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所以但凡有拜师者,他都来者不拒。詹国平先后收徒十余名,有的是因为兴趣,有的是为了谋生,徒弟们一有时间便会到工作室请教他,他都耐

心教导。

此外,詹国平还带着惠安女服饰制作技艺走入中小学、幼儿园,通过小小绣品让学生们了解惠安女服饰,在动手中喜欢上这一传统服饰,他希望,这些孩子将来也能加入惠安女服饰这一非遗文化的传承队伍当中。

桌案前詹国平神情沉着,每一次穿针、每一次踩缝纫机,都如此娴熟,在不断钻研的匠心和不断弘扬惠安女文化的初心下,一件件精美的惠安女服饰诞生。常有人问:詹师傅,你还能做多久?他的回答是:直到干不动了!



詹国平收藏的惠安女服饰领带

(接3版)

## 家国天下,继往开来

嘉庚精神并非一时一人之思想,而是一个深邃博大的精神传统,生生不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力。作为嘉庚先生的忠实学生,孙炳炎既很好地继承了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热心社会的精神,同时又对其予以现代转化,使嘉庚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从而超越时代,历久弥新。

20世纪初,陈嘉庚先生面对国家贫弱,海外华侨寄人篱下、饱受屈辱,整体上未能凝聚成一股力量的局面,致力于跨越籍贯帮派广纳贤士。南洋华侨在嘉庚先生号召之下空前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展现出超帮派、超地域的爱国精神。在嘉庚先生归国,其接手新加坡华社领导工作以后,孙炳

炎沿着嘉庚先生“跨帮派”凝聚南洋华侨而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的交流促进工作,并使华人社团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炳炎先生在领导社团工作期间,出于对嘉庚先生抗战期间联合东南亚华人社团经验的领悟,及其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敏锐眼光,突破了传统社团交流的血缘、地缘局限,放眼天下,不断将社团活动推向深入、推向国际,从而推动东南亚华人社团步入跨文化整合发展阶段。他在1965年3月就任中华总商会第三十三届会长,推崇立足工商本业,扩大国际经贸和文化交流。而这一系列活动中影响面最广的,无疑当属炳炎先生1994年5月筹办和成立的“世界同安联谊会”。“世同会”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安乡亲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

贸交流与合作。至今为止,世同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在加强中国与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成长、社会趋于稳定,有了更迫切的发展需求和与世界接轨的客观需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以孙炳炎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又起到了连结内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功能从“输血济困”渐渐转而为“造血发展”。1980年,炳炎先生听闻厦门设立国家经济特区,立即组织投资力量返乡考察。一来希望能找到新的商业机会,二来也是为家乡的经济成长尽一份力。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客观上来说投资条件和环境还并不完善,这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来说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炳炎先生仍然毫不犹豫地亲自回乡

投资兴业,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筹办“世同大会”带动大批海外同安乡亲回乡团聚、考察交流,“让同安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认识同安”,在厦门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乡情浓浓的沟通之桥、机会之桥。

孙炳炎承嘉庚衣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可谓不遗余力。他虽然最终加入了新加坡国籍,却始终未忘中华文化之本。他在经营同安会馆时,就常常通过举办传统诗词培训班、灯谜会,举办“华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学术讲座并广邀中国大陆、台港以及美国、澳洲、日本、马来西亚学者参加等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就连1970年筹建新加坡中华医院,“弘扬中医文化”也成为其目的之一。但同时,孙炳炎对文化事业发展的开拓性眼光又使其并不囿于传统文化在华人圈中的传承,而是争取得到当地不同文化

族群的普遍认同与接纳,并藉此使中华文化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除了希望同安同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之外,也希望其他的人群(籍贯/人种)和平安康”。这无疑就是炳炎先生对传统的“大同”思想所作的现代阐释和发扬。原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曾任新加坡同安会馆副主席的杨松年先生在忆起孙炳炎时也曾说道,炳炎先生领导的社团由最初的服务乡亲,“慢慢发展到承担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使命,一直到现在走出新加坡、走出东南亚、走向世界,发展越来越好,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总之,以孙炳炎为代表的这一代海外华人,在依旧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国际化的眼光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与在地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中华文明在海外的传扬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